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研究专题

明代《孙》注第一声

——刘寅《武经直解·孙子直解》的特点及成就

梁娟娟

(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 要:明代兵学思想异常丰富,对《孙子兵法》的注解也颇多新论,刘寅的《武经直解·孙子直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是书注释、校勘并重,借鉴了曹操、杜牧、张预三家注本及元末张贲一家之稿本,但又非人云亦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注释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但不曲解,注意挖掘孙子思想的深义,多发新论,并善用历史上的战例加以说明;校勘方面成就卓然,既参照旧本校订了当时流传版本中的错误,还调整、校订了《孙子兵法》的脱漏简;语言浅显易懂,理论水平很高,在明代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刘寅;《武经直解》;《孙子直解》;明代兵学;儒家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cnki.1673-2618.2023.03.006

刘寅的《武经直解》是明代武经的最早注本,他也是第一个为《武经七书》中除了《孙子兵法》外其他六书作注释的人。关于刘寅的生平,因史料阙如,所知不多,其《武经直解·序》中有一段话:“拱辰名寅,山西太原崞人,其先君菊斋处士尝以道学自任,间能谈兵,当元末教授乡里,入国朝,拱辰登洪武辛亥科进士,累历显任,并著能声。”^{[1]260}《明史》不为刘寅立传,从这段序文中仅能略见其生平一二。刘寅,字拱辰,元末明初山西太原府崞县(今山西原平)人。其引用书目云:“张贲注。予少时,避兵山谷间,受读于先人菊斋处士。亡其书已四十余年,今但能记其大略耳。”^{[2]33}他在《九变篇》的注文中说:“愚十八九岁时,遭元季抢攘,尝从先人授读。亡其书(指张贲《孙子注》)四十余年,今尚能记其大略。”^{[2]236}可知,刘寅年少时为避元末战火曾避居山中,跟随先人菊斋处士学习,并研读兵法。洪武四年

(1371),刘寅中进士,其为官生涯如何,除了上文的“累历显任,并著能声”之外,未见其他记载。其著述除了《武经直解》,还有《集古兵法》一卷,已经亡佚。

一、《武经直解》的修纂

《武经直解》于洪武三十年(1397)动笔,其时刘寅已过知天命之年。“越明年稿就,又明年书成,凡二十五卷、一百一十四篇,总若干万言,题曰《武经直解》”,成书之速犹如神助,应与刘寅半生浸淫兵法成书在胸密切相关。其《武经直解·自序》直言写此书的目的有三:一是适应现实需要,响应统治者的号召。“洪武三十年岁在丁丑,太祖高皇帝有旨:俾军官子孙讲读武书通晓者,临期试用。”明初面临的战争隐患不少,朱元璋居安思危,重视武备,要求军官子孙学习兵书,以为国家培养武备人才。二是补《武经七书》之不足。

收稿日期:2023-03-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孙子学研究”(20FJJSB003)

作者简介:梁娟娟(1982—),女,山东淄博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孙子兵学与明清史研究。

E-mail:liangjuan 9993@163.com

当时,《武经七书》诸本,除《孙子兵法》外,“《吴子》以下六书无注”,《吴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唐李问对》等书均无注释,不便于传习研读。三是订正讹误,梳理观点,纠正时下版本的诸多问题。明初流传的《武经七书》“市肆板行者阙误又多”^{[2]21-22},《孙子兵法》一书的多重注本,各家说法不一,甚或互相矛盾,划一各家学说,有助于学者对经典的理解。

《武经直解》二十五卷,包括《孙子》三卷、《吴子》二卷、《司马法》三卷、《唐李问对》三卷、《尉缭子》五卷、《三略》三卷、《六韬》六卷;《明史·艺文志》载二十六卷,是将附录一卷列入。刘寅为注释《武经七书》,作十条凡例:

一,《武经直解》为初学者作,若失之略,恐未能晓,不若不解耳。一,七书次序,宋国子司业朱服校定,先孙、吴,而后《六韬》,亦未知何义,今姑因其旧耳。一,《孙武子》旧注互有得失,今选其理明而辞顺者取之,其不切于理而辞讹舛者,姑置之耳。一,《孙子》张贲注论,“道”字甚重,诸家说得极略,《军争》《九变》错简处,贲皆订正,今从之;其余篇内一句一字之误,并说见本条下。一,《汉书·艺文志》云:“《吴孙子》八十二篇”,“《吴起》四十八篇”。今《孙子》止有十三篇、《吴子》止有六篇,恐是后人删而取之,篇章只依旧日次序,并不改易。一,《吴子》以下六书,自来未见有注,幼时所读七书并无差误,凡云旧本者,皆据幼时所读七书而言也;凡云今本者,皆指近来书肆所刊讹传讹者而言也。一,《尉缭子》乃商鞅之学,儒者所不谈,然中间亦多有可取者,不以人废言可也。一,《问对》中有阙误处皆据《左传》及《通鉴纲目》正之。一,《三略》本《太公遗书》,而中间亦有黄石公之说,今但一二处明之,余在学者例推耳。一,《六韬》传于周史,中间不无傅会之说,已于《文伐》篇内辩之,其余尚多疑似者,后学择焉可也。^{[2]29-31}

由此凡例可以看出,刘寅作《武经直解》时侧重这样几项工作:第一,用浅显的语言详细解析武经七书。由于受众是初学者,因此用了“直解”的形式,用常人通晓易懂的语言解析兵书;为了避免解释不清,注解本着详细的原则;同时,还佐以相

应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第二,参照古本,校正当时流传的《武经七书》的错误。其中《孙子兵法》旧注颇多,刘寅选取曹操、杜牧、张预、张贲四家之言,校勘方面继承了张贲^{[3]410-411}的成果。第三,辨析真伪,疑者从疑,能明确辨别真伪的皆一一辨明,不能辨明存有疑问的录入文中,让后学自己思考,不轻易做出判断。

二、《孙子直解》的体例及校注内容

在体例方面,《孙子直解》的体例与其他六书不同,《吴子直解》等书多采用段注,《孙子直解》则采用句注,每篇篇名之后有题解,概括本篇主旨或梳理与前篇的内在关系,文中每句之后有解释,解释详细,引经据典,间有自己的看法或实例说明,有些篇末有作者的深思或阐发。

在《孙子兵法》的校注方面,刘寅主要侧重了如下四项工作。

第一,“讹舛者稽而正之”,即校勘,参照旧本校订当时流传版本中的错误。

如《九地篇》中,《武经》本、“十家注”本皆作“投之无所往,则诸刳之勇也”,刘寅注曰:“投之死地而无所往,故所向皆有专诸、曹刳之勇。专诸,公子光使刺吴王僚者。‘刳’,当作‘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执匕首以劫齐桓公者;若曹刳乃智士,非勇士也。”^{[2]314}“曹刳”应为“曹沫”,首发此意者是南宋的张预,他提出“刳当为沫”之说,却未做仔细解释。刘寅重审此说,理由是:曹刳论战中的曹刳是知理有谋的智士形象,挟持齐桓公的曹沫才符合此处的勇士形象。虽然目前学术界认为曹刳与曹沫是同一个人^[4-5],但因史书记载的不同,两人的事迹截然不同,刘寅改“刳”为“沫”更符合《孙子》原文的意境。再如“是故,方马埋轮不足恃也”一句,十一家注中,曹操注曰:“方,缚马也。埋轮,示不动也”。其他如李筌、杜牧、陈皞等人的注释都类似。刘寅却言:“或曰:‘方’,‘放’字之误也,言放去其马,埋轮于地,辕不得马而驾,车不得轮而驰,军士尚且奔北,散乱而不一,此放马埋轮之所以不足恃,以为不散之术也。”^{[2]316}经此解释,“方”在此句中的意思也确实更为通顺。

又如《用间篇》有言:“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其中“乡间”

《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皆作“因间”，刘寅注曰：“此五间之目也，旧本‘因间’作乡间，今从之。下同。”^{[2]354}“下同”就是将下文中的“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中的“因间”依据旧本改为“乡间”。

第二，“脱误者订而增之”，即调整、校订《孙子兵法》的脱漏简。参照张贵的旧注，刘寅调整了《军争篇》《九变篇》《九地篇》的错简。《军争篇》调整错简两处。一是在“不动如山”之后，注曰：“愚按：张贵注本此句在‘难知如阴’之下，‘动如雷震’之上”。显然，这种调整是非常合理的：这几句隔句为韵，“林”“阴”“震”押韵，而作“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也恰好相互为文，二者映衬。二是在“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之下，刘寅注云：“此本《九变篇》文，脱简在此，下文乃详辩之”。^{[2]223-235}

《九变篇》篇题题解之后，刘寅申明调整错简的重要性，曰：

愚按：此篇简编错乱，前人多因而傅会其说，惟张贵已能改而正之，其本刊行于世。……愚非敢佞于张贵而逆于牧、预诸公也，顾其理直与不直耳。或者曰：有一句解一句，何必改正。若如此说，《大学》《中庸》迷于《礼记》，程、朱不必表而出之，《尚书·武城》简编错乱，蔡氏不必订而正之。若直依旧说，目下可以欺人，其如识者何？后之君子宦游中国，必有得张贵注者，方信吾言之不妄也。^{[2]236-237}

可见，在调整脱漏简方面，刘寅继承了张贵注的成就，并加入了自己的思考，用“理直与不直”来判定调整是否合理。“据考现存各家《孙子注》，研究和调整《孙子》错简的，张贵是第一人”^{[3]410}，由于张贵的《孙子注》并没有流传下来，刘寅的校订工作尤其具有学术价值。

《九变篇》中刘寅调整了两处错简。一是在“圯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之后：

愚按：杜牧、张预诸家注皆以此五者为“九变”之事。殊不详“圯地无舍，衢地合交，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四句为《九地篇》文，乃强为之说曰：《九变》而止陈“五事”者，举其

大略也。《九地篇》中说“九地之变”唯言“六事”者，亦陈其大略也。又云：《九变》即“九地”之变。此言诚误后学。盖“九变”者，用兵之变法有九也；“九地之变”者，遇“九地”而处之有变法也。两篇主意不同。张贵注：以上篇“高陵勿向”以下八句通此篇“绝地无留”一句共为“九变”，甚是有理。予姑从其说而解之。学者详焉可也。^{[2]237-238}

二是在“绝地无留，此用兵之法也”句后，注曰：

“无”张贵作“勿”，盖“勿”者，禁止之词也。凡遇危绝之地，慎勿留止，若留止而不行，恐为敌人塞其险要，或有伏兵掩我不备耳。绝地如所谓“绝涧、天井、天罗、天陷、天隙”之类是也。此以上九者，乃用兵之变法也。^{[2]244}

《行军篇》调整错简一处，“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注曰：“张贵云：此句当在‘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之下。”^{[2]264}经过修改后，原文变为：“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经此修改，语意更完整，后文也更通畅。

第三，“幽微者彰而显之”，即探究、挖掘孙子思想的真义。对一些重要的兵学问题和用兵原则，刘寅或结合战例或阐发议论，都能做出颇有见地的探讨。如在《军争篇》“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句后，注曰：“愚谓：孙子论举军争利有损上将之失者，谓不可全军而往，劲者在先，疲者在后，力不齐而为敌所乘也。唐太宗征宋金刚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犹能取胜者，何哉？盖是时金刚既败，众心以沮，迫之则河东易平，缓之则别生他计。故兵有形同而事异者，不可执一观也”。^{[2]218-219}孙子说日行三十里，只能有三分之二的士兵能到达目的地，战斗力会受到影响。刘寅用唐太宗日夜兼行二百多里却大败宋金刚的例子，说明孙子的本义是揭示战法的灵活性而非绝对性，“兵有形同而事异者，不可执一观也”。这一解释把孙子灵活用兵的精髓阐释出来，说明刘寅对孙子思想的认识和把握极为到位。

又如“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句后，注曰：

“气者，三军之众所恃而战也，彼既夺其气，岂能与我战？心者，三军之将所主而谋也，彼既夺其心，岂能为之谋？”并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夺心”“夺气”。春秋时曹刿论战，是“阵久人倦而夺其气”；东汉时寇恂破苏茂，是“诳以声势而夺其气”；三国时张辽守合肥抗孙权，是“以勇战而夺其气”；北周宇文宪拒北齐段畅，是“以名位而夺其心”；唐朝薛仁贵抗击突厥，是“示以形貌而夺其心”。在敌我之间的夺心、夺气中，要谨防己方被对方夺心、夺气，“然必能守吾之气，使锐盛而不衰，然后可以夺彼之气也；能养吾之心，使闲静而不乱，然后可以夺彼之心也。气夺则怯于斗，心夺则乱于谋，下者不能斗，上者不能谋，上下怯乱，则吾一举而乘之矣”^{[2]228-230}。用易懂的语言将孙子这一带有辩证色彩的思想解释得清晰明了。

刘寅在《地形篇》最后讲：“此篇言地形，而中又以胜败言者，盖恐后世泥胜负之理于地形，而不尽人事之当为也，故于地形则曰‘兵之助’，料敌制胜则曰‘上将之道也’。孙武之意深矣。”^{[2]297-298} 孙子认为，地形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地形者，山川险易之形也，用兵不知地形，则战守失利，故地形为兵之助”，地形很重要但只是战争的辅助因素，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人，“计险厄、远近为上将之道，学者不可不察也”^{[2]281}。刘寅的解释把战争中“地”与“人”的关系讲清了，符合孙子思想的本义。

第四，“傅会者辨而析之”，即厘定各家言论，有定见的划一观点，存疑的则收录观点供读者思考。如对《计篇》“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一句中的“将”，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读作平声，有人读作去声。如张预就读作平声，“谓将者解也”，认为“孙子以此解，激吴王而求用，言吴王将听我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我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刘寅认为，若作此解释，“非忠厚之心，恐失孙子本意”。孙子作《孙子兵法》，“将欲传之后世为众人法耳，不应中间用此数语解，激吴王而求用”，这不合常理。所以，刘寅参考了张贲的注解“前‘将’字，指大将而言，此‘将’字指偏裨之将而言也”^{[2]119-121}。刘寅结合春秋末期的时代背景和前后文的意思判断，此

处的“将”应为去声，意为裨将，而非为平声；前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此“将”为大将。大将的命令裨将执行得好，战争就会取胜，这样的裨将就是堪用的人才，“留之”；反之，如马谡不能很好地执行诸葛亮的命令，导致街亭失手，就非可用之将才，就可“去之”。这一解释既联系了前后文，还兼顾了当时的现实环境，非常有道理。

《虚实篇》“作之而知动静之理”一句，张贲作“诈之而知动静之理”，刘寅认为“作”比“诈”合适：

愚按“作”字不止激作，敌人凡有所施为皆“作”也，故杜佑引此为：候之而知动静之理。谓：远斥候，而知敌人之动静也。张贲本为“诈知而知动静之理”，谓：或诳之以言，或诱之以利，或示之以害，多方以诡道欺之，则敌之动静可知。夫两国交争，务知彼之动静，则我易为之胜。若韩信欲破赵，必先探知陈余不用李左车之言，然后敢出井陘，若不知彼之动静，不惟不可以取胜，又将自取其败耳。^{[2]207-208}

可见，刘寅虽看重张贲的注解，却并不盲从，而是以“理直与不直”为标准判定注解是否切合孙子原意。

刘寅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其《武经直解·孙子直解》在校勘和注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明代兵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三、刘注《孙子直解》的特点

刘寅是明朝第一位给《孙子兵法》作注的学者，《孙子直解》校勘与注释并重，理论水平较高；且除了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之外，还没有为《武经七书》中的剩余六书作注者，而刘寅亦未见到施氏的《七书讲义》，故，他的《武经七书直解》对校注其他六书亦有开创之功。是书一经问世，即广为流传，成化二十二年（1486）李敏刊行此书时为之作序，赞称：“其注释详明，引据切当，开卷读之，不待师传而自会其意，诚兵家之宝也”^{[2]15}。其《孙子直解》的校注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儒家之“仁义”注兵家之“机权”，带有明显的以儒释兵色彩。刘寅是洪武四年（1371）的进士，他饱受儒家经典熏陶，儒学的浸润是深入到骨子里的，在注解兵书的时候就自觉

地以儒家理论解析兵学思想,使兵学理论处于儒家思想的统领下。在“序言”中,刘寅自己就说注释兵书的指导思想是:“取其书(指《武经七书》)删繁撮要,断以经传所载先儒之奥旨,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格言,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而增之,幽微者彰而显之,傅会者辨而析之”。并“取儒家诸书、先圣先贤之所著述,有切于兵法者,编为附录”^{[2]21-22},即摘选《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传》《论语》《孟子》《中庸》等儒学经典中切合兵法的内容,编为《兵法附录》一同收入《武经直解》中。刘寅认为:“《武经》言仁义、礼智、道德、忠信与儒家无异,但用之者自有大小、浅深、精粗、广狭不同,岂别有所谓仁义、礼智、道德、忠信者哉?”^{[2]34}在他看来,兵家的“言仁义、礼智、道德、忠信与儒家无异”,区别在于所用之人不同耳,正如“李敏序言”中所说“是书也,岂徒专为权谋譎诈?顾人用之何如耳。汤武用之,则为仁义之师;孙吴用之,则为譎诈之术。仁义得之愈久而愈昌,诈术取之随得而随失”^{[2]18}。此论固然值得商榷,却明显表现出刘寅、李敏等人以儒为宗的思想倾向。

《孙子直解》的注释中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随处可见,如《始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一句后,刘寅注曰:

道者,仁义、礼乐、孝悌、忠信之谓,为君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维持之以礼乐,教之以孝悌、忠信,使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与君同心同德,上下一意,可与之同死,可与之同生,虽有危难而不畏惧也。昔武王有臣三千,同心同德,是与上同意也;纣有亿兆人,离心离德,是不与上同意也。荀卿曰:“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而覆胸臆,斯可与同死同生也。”^{[2]111-112}

孔子提倡的礼乐、孝悌,荀子提倡的仁义之兵,都被用来阐释孙子的“道”;并佐以武王得道、得民心,最终得天下,纣王失道、失民心,最终失天下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

《武经直解》“序言”中明确指出:“其书中论道德、仁义、忠恕、敬信,皆儒者之范模,辨尉缭之非,明李靖之失,折商英之虚无以阐《三略》《素

书》之真伪,抑周史之傅会以昭文王、太公之本心,辟邪说、拒彼行,存天理遏人欲,又皆儒者之权度。”^{[1]260-261}以儒家的济世救民情怀解析兵家的某些思想当然不够准确,却是如刘寅这些儒家学者在跳脱不出儒家束缚时对兵学的折中,亦反映出在儒学的全面笼罩下兵学独立地位丧失,不得不置于儒学统领的尴尬处境。

第二,校勘中广泛使用理校法。理校法是校勘的方法之一,就是运用分析、综合、类比等手段,据理推断古书中的讹误。刘寅在《孙子直解》中校订了流传版本的一些错误,其校勘的依据就是“顾其理直与不直耳”,实际就是理校法。

《九地篇》言“诸刳之勇也”,刘寅认为“刳”当为“沫”,春秋时曹沫执匕首挟持齐桓公迫使其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以勇力著称,是勇士;曹刿在齐鲁长勺之战中因其名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以智克力,一战成名,是智士。上古音“刳”“沫”二字皆入物部,“刳”当是后人传写致误,所谓同声而致误也。

又如《火攻篇》言“昼风久,夜风止”,刘寅引用张贲之言,认为:“张贲云‘久’字古‘从’字之误也,谓白昼遇风而发火,则当以兵从之;遇夜有风而发火,则止而不从,恐彼有伏反乘我也,即上文‘可从而从,不可从而止’之义。若作‘久’字,甚无意味”。实施火攻要在放火的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出动兵力配合,毕竟放火只是辅助手段,关键还得靠兵力的配合,只点火而不出兵是无法取胜的。结合上文“可从而从,不可从而止”推断,此处若作“久”,意为白天风刮久了,晚上就会停止,不仅逻辑不通,与上文也联系不起来。若作“从”,白天视野开阔,顺风放火,军队可以跟进攻击;夜里顺风放火,为免敌人有伏兵,军队不能随之发起进攻。如此看来,这一解释是非常有道理,“昼风从,夜风止”比“昼风久,夜风止”更为贴切。

再如“水可以绝,不可以夺”一句,刘寅言:“张预曰:‘水止能隔绝敌军之前后,取一时之胜,然不若火能焚夺敌之蓄积而使之灭亡也。’张预云:‘水可以绝,火可以击。’谓水可以隔绝人之军,若韩信决壅囊,水大至,使龙且军分而为二,因奋击大败之;火可以焚夺人之物,若曹公焚袁

绍辘重,绍因以败亡,是也。但‘不’字为‘火’字之误耳”^{[2]343-345}。经此修改,文义更加通畅。

第三,注意文章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刘寅在注释时非常重视各篇之间和上下文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注释或联系前后文、或联系前后篇,解释通透。如《虚实篇》“故曰胜可为也”一句后,注曰:

吾故曰兵之胜可为也,《军形篇》曰“胜不可为”者,以敌之有备者言也,敌若有备,故胜不可为。此曰“胜可为”者,以越(接前句: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必不能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取胜在我,故可为也。^{[2]203}

《形篇》讲“胜不可为”,《虚实篇》又讲“胜可为”,似乎前后矛盾,实际并非如此,是因情境不同,故结论不同。

在《九地篇》开篇,刘寅解释此篇与《地形篇》的不同讲:“九地者,谓地之势有九也。上篇言地形。乃地理自然之形也;此篇言九地。因兵所至之地而势有九等之别也。上篇盖言地形之常,此篇盖言地势之变,故篇内有云:九地之变,屈伸之利。此地形、九地所以分而为二也”^{[2]298}。两篇都是谈地形,但各有侧重,《地形篇》谈自然地理,《九地篇》谈兵势地理,故分为两篇。

刘寅非常注重从整体上解析孙子思想,在《用间篇》最后,刘寅言:

愚谓:孙子首以《始计》而终以《用间》,盖计者,将以校彼我之情,而间者又欲探彼之情也。计定于我,间用于彼;计料其显而易见者,间察其隐而难知者;计所以定胜负于其始,间所以取胜于其终;计易定,而间难用。故曰:非圣智莫能用间,非仁义莫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皆难之之意也。孙子于篇终言之其有旨哉。^{[2]365}

将首篇《计篇》的知彼之情与末篇《用间篇》的用间结合起来,揭示了孙子思想的内在关联性,将十三篇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

第四,对待前人的观点上,是则称是,非则称非,疑者从疑。《孙子直解》一书中刘寅引用了魏武帝、杜牧、张预和张贲四家的观点,对于前人的

观点,刘寅认为正确的就继承下来,如张贲校勘的《军争篇》和《九地篇》的错简,刘寅认为很有道理,就沿用了其观点;但前人的有些看法,刘寅认为不正确的,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虚实篇》“作之而知动静之理”一句,杜佑作“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张贲作“诈知而知动静之理”,但刘寅认为原文“作知而知动静之理”最准确,“作”就是探查敌情,就是“知彼”,并非只有通过“诈”这一途径,故用“作”比“诈”合适。

《九地篇》“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句后,刘寅注曰:“此专言‘为客之道’,故于九地中拈出衢、重、轻、围、死五者明之。杜牧、张预谓九地而止言五事,举其大略者。非也”^{[2]323}。

对于前人注解中不能判断正误的,刘寅通常将观点列出,以便读者自己思考。如《虚实篇》“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一句中的“吾”,张预认为“‘吾’乃‘吴’之误也,言以吴之兵度越之兵虽多,无益于胜”。刘寅认为此解“亦通”^{[2]203}。《军争篇》“故军争为利,众争为危”一句,张预解释为“智者争之则为利,庸人争之则为危”,刘寅认为原文本无“智者”“庸人”字,“其说未知是否”^{[2]216}。《行军篇》“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瓠,不返其舍者,穷寇也”一句后,刘寅注曰:

一本作“粟马肉食,军无悬瓠,不返其舍者,穷寇也”。“粟马”谓以粮谷秣马,“肉食”谓杀牛马飧士;“军无悬瓠”,悉破之,示不复炊;“不返其舍”,昼夜结部伍,是皆穷寇,必欲决一战耳。未知是否。^{[2]275-276}

不主观臆断、不无的放矢的注解态度,使得《孙子直解》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

第五,大量引用战例,以更好地解释或佐证孙子的观点。事实胜于雄辩,兵法理论最终要回归到战争实践中,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刘注善用战例,让抽象的理论变得生动鲜活。如在《始计篇》中就用了42个战例来解析孙子原文,这些战例的使用方式灵活多样,有的详细介绍分析,有的罗列几个相同的例子类比,还有的用正反对比的方法,加深读者对孙子某一思想的认识。如在

解释“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一句时，刘寅详细分析了韩信的井陘之战：

韩信知赵王陈余不用李左车之计，是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陘，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又选二千人，人持一赤帜葦山而望赵军，戒曰：“若赵空壁逐我，则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明日，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陘口。此因利制权之事也。

对“兵者，诡道也”一句解释时，则罗列了四个类似的例子，“如栾枝曳柴扬尘、孙臆令军减灶、田单神师火牛、韩信囊沙壅水”，并未展开详细论述。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时，则采用了正反对比的方式，引用了周武王虽仅“有臣三千”却“同心同德”，故而能战胜“有亿兆人”却“离心离德”的商纣王。在解释“主孰有道”后，对比了汉高祖和项羽入关后的不同表现：“汉高入关，秋毫无犯，秦人大喜；项羽入关，杀子婴，烧宫室，掠妇女宾货，而东秦人大失望，此汉高所以终胜，而项羽所以终败也”^{[2]122-123}。通过对比，孰胜孰负一目了然。大量战例的运用不仅为孙子理论提供了战例依据，还方便了学者的理解和阅读。

四、《孙子直解》的版本及影响

自宋代《武经七书》正式列入学馆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在注释方面，除了《孙子兵法》的注家代不乏人，《吴子兵法》等其他六书除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外，史不见载。刘寅的《武经直解》遍注七书，在《武经七书》的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加之其在注解过程中的一些良好做法，一经刊出即备受时人好评。在成化、嘉靖、万历、崇祯等时期各有刻本，主要版本有：成化二十二年（1486）赵英刻本二十五卷附录一卷，现藏重庆北碚区图书馆；嘉靖年间刻本十九卷，现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万历九年

（1581）莫与斋刻本二十五卷附录一卷，内含清钞本《吴子直解》，现藏南京图书馆、重庆北碚区图书馆；崇祯十年（1637）翁洪业刻张居正增订十二卷本，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日本宽永二十年（1643）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1933年上海军用图书社、江苏省图书馆影印丁氏八千卷楼藏明万历九年刻本，二十五卷附录一卷，现藏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等地。

刘寅的《武经直解》解析详细，用语通俗，对于研读兵法或从事兵法研究，都大有助益，因此时人对此评价很高。成化年间刊印是书时，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敏为之作序，曰：

其注释详明，引据切当，开卷读之，不待师传而自会其意，诚兵家之宝也。……此书一出，则武弁辕门之家，英豪俊髦之士，朝讲夕读，自然增其智识，长其谋略，名臣良将接踵而出，守边疆于永固，保宗社于无穷矣。^{[2]15-17}

他指出此书的优点是注解详细，引证切当，语言通俗易懂，将士和爱好兵法的学者自己就可以读懂。

万历刻本刊行时，何起鸣为之作序，言：

是书间出幻化，即不尽轨于正义，大较战守攻围、离合、奇正，了然指掌矣。……是书也，盖欲习者悟其机于迎刃转圜之间，以储干城腹心之选，匪直资若曹齿颊谭也。嗟乎，喜建竖者，儒吏抵掌乎韬铃，斗藻绩者，武吏饰名于觚管，比皆越俎治矣。文武攻其业，以为国家彪炳中外，庶几答百世之遇。是书可少之哉？^{[2]9-12}

他认为《武经直解》在有关战争指导方面的攻守、分合、奇正等原则上解释详尽，无论是儒者还是将吏，要掌握用兵的基本问题，都不会舍弃此书。

参考文献：

- [1]刘寅. 武经直解[M]//谢祥皓, 刘申宁. 孙子集成: 2. 济南: 齐鲁书社, 1993.
- [2]刘寅. 武经直解[M]//《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 中国兵书集成: 10.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0.
- [3]古棣. 孙子兵法大辞典[Z].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4.
- [4]李零. 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 为读者释疑, 兼谈兵法与刺客的关系[J]. 读书, 2004(9): 129-134.
- [5]王青. 从口述史到文本传记: 以“曹刿—曹沫”为考察对象[J]. 史学史研究, 2007(3): 18-26.

The First Annotation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ng Dynasty

—Features and Achievements of Liu Yin's *Di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Wu Jing • Di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 of War*

LIANG Juanju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n Tzu,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extremely rich and had many new comments on *The Art of War*. Liu Yin's *Di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Wu Jing • Di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 of War*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Although it paid equal attention to the annotation and collation and utilized the annotation of Cao Cao, Du Mu and Zhang Yu and the manuscript of Zhang Ben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it didn't just echo the views of others and had its own unique thoughts. The annotation had obvious Confucian elements without any distortion. It paid attention to the deep meaning of Sun Tzu's thoughts, had many new comments and made good use of historical war examples to make illustration. In collation aspect, it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not only correcting the errors in the current vers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old version, but also adjusting and revising the missing slips of *The Art of War*. Its language was easy to understand and the theoretical level was very high, which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ilitary science in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Liu Yin; *Di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Wu Jing*; *Di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 of War*; military scienc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Confucian school

(责任编辑:许 金)

本 刊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等在其各自的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及在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和稿酬(即包括印刷版、光盘版和网络版等各种使用方式的报酬)一并支付。如作者对本声明持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